

敘事、再現、啟蒙 ——林獻堂一九二七年日記及《環球遊記》 的文化意義

林淑慧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林獻堂為台灣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知識菁英，於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其日記不僅因牽涉眾多事件而具有歷史厚度，且蘊含個人的思想關照。他又是日本殖民時期首位遠至歐美多國旅遊的台灣知識分子，遊記所錄旅途時間之長、空間移動之廣，當時難有台灣人能超越他，更增添他的旅遊書寫所蘊藏的學術研究價值。本文以林獻堂一九二七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為文本，參考旅行、敘事等理論概念，分別就「從日記到遊記的自我敘事」、「世界歷史記憶的再現」、「日記與遊記的文化啟蒙論述」等三個主題面向加以探討，以期能呈現這位台灣知識分子的日記與旅遊書寫在文學與文化史上的特殊意義。

關鍵詞：林獻堂、日記、旅遊書寫、敘事、啟蒙、日治時期

Narration, Representation, Enlightenment: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Lin
Xian-tang's Diaries in 1927 and *Travel*
Notes Around the World

Lin Shu-hui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s one of the elite intellectuals of Taiwan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in Xian-tang sits on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history of Taiwan. His large volumes of diaries recorded many significant historical incidents and events of Taiwan, and his personal opinions in the diaries are also of great values. He was the first Taiwanese intellectual to take extensive travels to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refore, his travel notes are the richest among his contemporaries and treasures for the academic studies.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f Lin Xian-tang's diaries and travel notes to Taiw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are the emphasis of this essay. The following essay will mostly refer to Lin Xian-tang's diaries in 1927, his book *Travel Notes around the World* and other concepts and theories on travel experiences and narration. The discussion will involve three themes, "Self-narration

from the diaries to the travel notes”, “The reemergence of the historical memories of the world”, “The discussion of the cultural enlightenment in the diaries and the travel notes”.

Key words: Lin Xian-tang, diary, travel writing, narration, enlightenment, Japan-ruling period

敘事、再現、啟蒙

——林獻堂一九二七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的文化意義

一、前言

林獻堂（1881～1956）為台灣文化史上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他長期所寫的日記，蘊含與台灣命運緊密相連的敘事。歷史學者認為林獻堂的日記資料，包含家族歷史、經濟活動、政治社會以及文化活動等資料。其日記的史料價值在於當時人記當時事，有別於回憶錄及口述歷史。且日記中所載的活動，有不少是以林獻堂為主體，或是以他為重要人物所展開活動的記錄，如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一新會等。故此日記不僅是林獻堂一生最重要的見證，也可補充官方資料的不足，史料價值極高¹。目前所留存林獻堂的日記經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整理編纂成《灌園先生日記》，第一冊始自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此亦是林獻堂環球之旅的第一年。日記止於一九五五年，中缺一九二八、一九三六年，前後長達二十七年，跨越日治、戰後兩個時代。《環球遊記》則為他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起，至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抵橫濱止，約一年左右的時間，與二子攀龍、猶龍在歐美各地旅遊的見聞紀錄。曾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起以〈環球一週遊記〉為名，開始在《台灣民報》上刊載，直到一九三一年十月三日為止，共連載一百五十二回。內容除了旅遊中生活的實錄之外，也包括了異地風情、政治經濟、民生議題等題材。當時正值壯年的林獻

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2000年），頁6-13。

堂，不僅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實現自己環球旅行的願望；也從當時台灣文化團體紛擾的時期中暫時抽身，因而能在異地文化巡禮後，以日記與遊記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感，也開擴了他的文化視角及世界觀。

對於林獻堂的研究，較多關注於他參與政治社會運動中的情形；文學方面，則大多聚焦於探討與櫟社的關係或詩歌的成就。而有關日記的研究成果，在紀念林獻堂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的「日記與台灣史研究」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06）中，有數篇林獻堂的日記以及相關歷史背景的研究，如：陳世榮〈近代台灣菁英的訴訟經驗——以林獻堂與張麗俊的日記為核心〉、何鳳嬌〈從林獻堂日記看大戶餘糧問題〉、黃子寧〈林獻堂與基督教（1927~1945）〉、林蘭芳〈儒佛耶三合一的宗教觀：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學佛因緣〉、林丁國〈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體育活動〉、范燕秋〈從《灌園先生日記》考察林獻堂的身體衛生觀及其實踐〉以及高雅俐〈從《灌園先生日記》看 1920~1930 年代霧峰地方士紳的音樂生活〉，這些論文從各方面呈顯出林獻堂日記的學術價值。至於《環球遊記》的研究成果，早期綜論此遊記的代表作為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1998），為全面探討林獻堂旅遊的背景、遊記書寫的風格特色、重刊風波與版本修改等議題。以比較遊記的方式的有：洪銘水〈梁啟超與林獻堂的美國遊記〉（2000），徐千惠《日治時期台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2001）等篇，論及出版禁制的情形。以遊記中的主題為研究核心的有：方孝謙〈一九二〇年代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認同政治〉（2000）、尤靜嫻〈遊目歐美，遊心台灣——試論林獻堂《環球遊記》中的現代性〉（2004），以及張惠珍〈他者之域的文化想像與國族論述——林獻堂《環球遊記》析論〉（2005），亦觸及林獻堂遊記中的所蘊藏的現代性、認同、國族論述等議題。

雖然近幾年有關林獻堂的日記與遊記研究，已累積一些具體成果。但因林獻堂為當時的知識菁英，於台灣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其日記不僅因牽涉眾多事件而具有歷史厚度，也蘊含個人的思想關照。且他又是日本殖民時期首位遠至歐美多國旅遊的台灣知識分子，遊記所錄旅途時間之長、空間移動之廣，當時難有台灣人能超越他，更增添他的旅遊書寫所蘊藏的學術研究價值。然而，

目前有關林獻堂一九二七年的日記與《環球遊記》的探究，至今仍留一些尚待爬梳與詮釋之處。例如：林獻堂日記與遊記兩種不同類型的文本，兩者之間有哪些關連？又如何自我敘事？表現手法是否有顯明的差異？為何選擇這些國家的景點作為參觀的重心？當他參觀世界各地的古蹟、遺址、歷史場景或博物館後，遊記是如何使歷史記憶再現，又為台灣讀者帶來何種新的想像？在旅遊的過程中，因接觸異國文化而帶給他何種衝擊與思考，林獻堂如何藉由遊記建立啟蒙論述？新文化史或稱為社會文化史的研究，不僅嘗試發掘文學作品中的史料意義，即使是官方文件、文獻等傳統的史料，也以新的方式來閱讀。內容包括飲食、服飾等物質文化的研究，或是身體、性別研究、記憶的社會歷史、形象的歷史、對政治的態度及組織的方式等主題研究。新的主題引起學界對新的史料的關注，並力求尋找其措辭方式和表達策略，同時置於社會的和歷史背景中進行反思。故本文擬以林獻堂一九二七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為文本，參考旅行、敘事等理論概念，分別從日記到遊記的自我敘事、世界歷史記憶的再現、日記與遊記的文化啟蒙論述等三個主題面向加以探討，以期能呈現這位台灣知識分子的日記與旅遊書寫在文學與文化史上的特殊意義。

二、從日記到遊記的自我敘事

日記為個人每日生活的紀錄，是關於「自我」的敘事，且多在當下的時空寫成，而非以回顧的方式書寫。日記的寫作也被視為對「自我」的一種「內化的訓練」與「建構的技術」；日記在理論上是一種個人的、私密的文字呈現，作為一種近代社會自我覺知、自我意識的標記，其本身就具有現代性的意義²。尤其當作者以自我環球之旅的經驗作為敘述主體時，更呈現以個人為中心的世界觀。林獻堂一九二七年的日記保存自我以及世界新體驗的具體紀錄，也在《環球遊記》中抒發體驗現代性的見解。從異國的都會消費文化、政經文教等制度，因所見的差異而加以比較，在觀摩的過程中，重新檢視自己的文化，進而延展視野。他的日記體是以古典文體書寫，卻承載旅行的現代見聞；又因報刊傳播

² 曾士榮，〈1920年代台灣國族意識的形成——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21-1932)〉，《日記與台灣史研究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6年)，頁2。

媒體的興起，遊記有新的發表管道，也因此影響遊記敘事功能的呈現。學者 Mieke Bal 於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提到：在旅遊的故事中，移動本身就是一個目標，希望從移動中得到改變或解放、自省、智慧或知識³。關於林獻堂的旅遊動機，從《環球遊記》看出早在旅遊出發的十八年前即立下志願：如果兩個兒子都能自大學畢業，就與他們一同至歐美漫遊環球旅行⁴。另一個出國旅遊的動機是則與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有關。文協因為內部路線之爭，後來由左派控制文協，退出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並著力於農民運動與階級鬥爭；右派則退出文協，另組台灣民眾黨，繼續支持台灣議會。《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記錄了文協理事會及一月三日文協臨時大會的相關事宜。林獻堂會前擔憂「六年間辛苦奮鬥之歷史，具付諸東流，實為可惜⁵。」於台中市公會堂舉行的臨時大會中，他擔任議長目睹文化協會的分裂場面，心中實感哀痛。在事後他辭文協的委員長，後應允繼續任職至出國前。在這樣的背景下離台一年八個月，呈現出林獻堂欲暫時抽離台灣文化協會內部的衝突，計劃到各國旅遊以沉澱心情；同時也藉由空間的轉換，實地觀摩西方體驗歷史文化的風貌。從一九二七年《灌園先生日記》有關旅遊出發之前的記錄中，則可得知除了長子攀龍在倫敦常寫信寄望父親盡速前往外，此趟旅行亦曾得到某些友朋支持。如林景仁再三囑咐林獻堂如確定歐遊出發之日必定要告知他，他將到法國馬賽（Marseille）迎接，並留下在瑞士的住址，令林獻堂感佩親切情意⁶。林景仁為板橋林姓大家族林爾嘉的長子，林獻堂與林景仁有私交，當年適值林景仁赴歐時期，並表達樂與林獻堂於歐相聚。而林茂生三月十四日寫信告知，將於四月廿八日由橫濱乘船渡美，對於未能與林獻堂同遊歐洲，表達遺憾之意。在勸阻成行方面，則有三月十一日的記載：蔡惠如、蔣渭

³ Mieke Bal: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7, p.137。

⁴ 林獻堂，《環球遊記》，收錄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遺著》（台中：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1956年），頁1。

⁵ 同上註，頁7-16。

⁶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頁93。有關林景仁的資料，可參考王國璠，《板橋林本源家傳》（台北市：林本源祭祀公業，1985年）。林景仁終身未受正規教育，卻懂日、英、法文，娶蘇門答臘橡膠王張煜南之女。曾任株式會社新高銀行董事、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監事、主持訓眉記，後因故經營失敗，乃隨父母林爾嘉夫婦赴歐七年。

水與蔡培火及諸同志將連名，請林獻堂取消歐美遊歷，將此三、四萬的費用，投入經營日刊新聞⁷。此即是林獻堂於遊記中提到即使「諸同志聞之，多不欲余之長期旅行，咸勸中止，余因是而猶夷者累月⁸。」他想到若錯失良機，以後可能無法實現志願，於是仍依進行預定的旅遊計畫⁹。由此可見，日記的資料正可與遊記相互補充。通常旅遊出發前對已經去過當地的旅遊者所提供的線索，如同行、同遊者（fellow travelers）都會激發旅遊中互動，因而引發出不同體驗，使個人的旅行經驗更加錯綜立體¹⁰。林獻堂的旅行曾得到本地或跨國友朋的協調幫助，而他的兒子更參與此趟旅程路線的規劃及沿途的翻譯，使林獻堂的旅遊能順利進行。

人類學者認為旅遊牽涉到三個層次，包括：地理距離的特質、探查者的特質、了解地理距離概念所反映的政教意識。若就廣義旅遊的動機而言，出外遊歷的原因雖然各有差異，包括高度的自我實踐，個人的利益；或為了政治性的、意識型態的、智慧性的本質，甚至於經濟的利益。這些旅遊的因素之所以會不同，通常取決於不同社會的環境，以及所反映的經濟和政治層面¹¹。即使在二十世紀的台灣，能有經濟能力從事環球之旅的人極為有限。人稱「阿罩霧三少爺」的林獻堂，具有霧峰林家的經濟優勢，故能從事這趟跨界之旅；並且由於他的文化素養，更使他的旅遊不只是休閒之旅。

旅行的動機與最終目的在於認識與回到自我，個人的理解實來自其旅遊過程的觀察、體驗、交流與哲學思索。林獻堂遠至歐美，與台灣相隔一大段空間距離，更容易感受到傳統與現代思潮的衝擊。這趟西方現代性的體驗之旅，對於他書寫的日記與遊記造成相當的影響，並提供後代研究林獻堂的另一視角。林獻堂藉由旅行體驗多元文化之後，這些觀點也可能成為讀者未來採用的觀點，因此個人的生命經驗更為豐富，並提昇在台灣文化界的象徵性地位。

⁷ 但林獻堂提出反駁的意見：一是經營日刊新聞不容易，以現在之狀態欲鳩集二十萬的現金；二是現時民報經營尚難覓相當人物，何況日刊新聞。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頁105。

⁸ 林獻堂，《環球遊記》，頁1。

⁹ 同上註。

¹⁰ 廖炳惠，〈旅行、記憶與認同〉，《當代》第57卷（2002年3月），頁87。

¹¹ Mary W. Helms: *Ulysses' Sail: an ethnographic odyssey of power, knowledge, and geographical*,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67.

休閒旅遊體驗是一種主觀的感受與思索，因日記與遊記多是寫自己的故事，所以敘事者的語態（voice）與人物的觀點（point of view）之間較無區分。林獻堂除了國族歷史等「大敘事」之外，也書寫記錄個人身體等的「小敘事」，呈顯日記與遊記的真實性，並使讀者感受遊記所營造的親切感。究竟林獻堂於一九二七年日記與遊記的寫作手法各有何特色？茲以表一加以比較：

表一 林獻堂日記與遊記寫作手法比較

	日記	遊記
篇幅詳略	篇幅短，較簡略。	篇幅長，較詳盡。
內容題材	旅遊記事為主，綜記生活瑣事。	以記錄旅遊為核心的專題。
時間順序	依每日生活事件的時間先後為序。	不專以參觀時間順序，而是依旅遊專題調整合併。
空間移動	記錄每日旅遊地點的移動。	不以實際旅遊地點移動為主的空間安排。
敘事功能	私密性的風格，具有日常札記的功能。	遊記投稿至報紙上刊載，且具公開而廣為傳播的效果。

資料來源：參考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1927年（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2000年）；及林獻堂，《環球遊記》（台中：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1956年）比較而得。

經閱讀林獻堂一九二七年日記與《環球遊記》後，可看出他是先簡要記錄每天的日記，再將日記改寫轉化成遊記，並投稿至報紙上刊載。大體而言，他的日記與遊記雖然就其內容題材上有高度的相似性與重疊性；但兩者的寫作手法有所差異，也呈現從私領域到公領域的過程。日記所載每日旅遊地點的移動及時間，都會按順序詳盡標明。如早上十點與次子猶龍一同參觀博物館，午後四時另與別人相約喝茶。同一地點，林獻堂可能在不同日子重遊，如：七月二十七日十一點曾參觀大英博物館，八月五日十點又記錄再次前往參訪博物館的閱書室。這些在《環球遊記》中，皆置於〈英國見聞錄·倫敦市〉的「大英博物館」一節中。可知日記是按時間順序紀錄，說明每日的空間移動；但是遊記是以相關類型的旅遊地點為核心，因此歸納不同時間參觀的見聞，將參觀過的地點皆歸納於同一節中敘述。如他書寫多次到倫敦市區公園的經驗，即是顯明的例證。

林獻堂的日記大多為簡略記載的札記，後來再擴寫成一篇篇以地點或事件為題的遊記，遊記中的〈法國見聞錄〉即為具體的例子。林獻堂自言他的歐洲漫遊此趟旅程共經過巴黎五次，分別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十月三日、十一月十日，以及一九二八年一月九日、二月二十七日¹²。從遊記中〈法國見聞錄〉「光明之巴黎」一節裡，觀察林獻堂遊記的敘事模式：他通常擇取當地最具代表性的地點或建築、人物及風俗民情，使讀者有鮮明的重點式印象，透過文字閱讀加以勾勒出一座城市或國家的輪廓¹³。此外，他更擅長將典故、歷史情節融入旅行書寫之中，使得遊記不僅僅是走馬看花的流水帳而已，更蘊含具有歷史厚度與豐盈的文化意義。例如在「拿破崙之墓」一節裡，林獻堂以長篇幅鋪敘回顧拿破崙當年以軍官的身分，一躍而為大將，團結國民以禦外敵，戰勝攻克威震全歐的事蹟。並將拿破崙與項羽作一類比對照，擷取古籍中的詩句，融入歷史場景的鋪敘，道出兩位「亂世英雄」相似的成敗之跡¹⁴。所謂敘事，並非簡單地反映現實，而是包含了選擇、重組、簡化現實等機制¹⁵。林獻堂於日記中擇取當天印象深刻的圖象，記錄行走過的痕跡；在遊記中亦選擇某些心中的風景，並加以鋪陳敘事。文中對世界都會的讚嘆與批評，以及對歷史人物形象塑造與褒貶，皆透露出他個人的思想與價值觀。

日記多具日常生活瑣事的功能，如前所述往大英博物館的途中換車時，曾與次子猶龍錯身，幸好最後在博物館相尋得的小狀況，在遊記中則未見此記錄。另有些瑣碎的日常記事則較無法置於遊記裡，如旅程中接獲電報的訊息只單獨存在於日記裡。如：八月二十五日昨晚閱大使館之書，係傳達後藤長官之電報，謂欲任余為總督府評議員，請即承諾。本早往大使館問其詳細，即復電辭之。此處的後藤長官是指文夫總務長官，林獻堂第一次任台灣總督府評議員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一直任到一九二三年三月十日，第二次在一九三〇年七月三日又再度被提名¹⁶。台灣總督府設置台灣府評議員，主要是迫於日本國會的壓力及為牽制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所做的努力，林獻堂是請願運動的領導者，但

¹² 林獻堂，《環球遊記》，頁 41。本論文所引《環球遊記》頁碼皆以此版本為主。

¹³ 同上註。

¹⁴ 同註 12，頁 47-48。

¹⁵ Hinchman, Lewis P., & K. Hinchman: *Memory, Identity, Community: The Idea of Narrative in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p. xiii-xxxii.

¹⁶ 後藤文夫總務長官的任期自 1924 年 9 月 22 日起至 1928 年 6 月 25 日止。《林獻堂先生紀念集》，頁 67。

他卻被田健治郎總督任命為台灣府評議員，以做為籠絡的手段。在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後，比變得原文化協會更反日、更激烈，林獻堂的溫和、識大體又成為總督府青睞的對象¹⁷。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林獻堂與長子攀龍、次子猶龍在英國旅行時，晚上由日本駐英大使館傳來總務長官後藤文夫的電報，欲再次任命林獻堂為府評議員。但林獻堂隔日即前往日本駐英大使館以電報回應，電報內容為：「深謝厚意，緣有種種事情，不勝遺憾，僅此告辭職¹⁸。」林獻堂已當過府評議員，沒有意願再接受只有諮詢權而無議決權的職務，況且人又在歐洲，因此婉拒後藤文夫對他的聘任。遊記中也載錄他閱讀報刊的情形：

新九月十一日，夜讀《台灣民報》在台灣八月一日發刊之第一號（一六七），睡稍遲。

新九月二十一日，昨日讀《台灣新聞》，載南部地震，其震源地在於鹽水街。本早命攀龍修書與陳秋逢¹⁹，問其有無受害。

從以上兩段日記，可看出即使在旅途中，林獻堂仍關心《台灣民報》、《台灣新聞》等報刊上所登載的台灣時事，或是地震等天然災害對各地的影響，並問候台南州學甲庄中州的陳秋逢。陳秋逢（1894～1971）為開業醫生，因位居報載的震源地，故林獻堂特別捎信詢問其受災情形。此外，他在日記裡也提到如何挪出時間，在旅途中將簡要的日記整理成有系統的專題遊記。茲引九月的日記為例：

新九月十八日早，攀、猶勸余廿五日往大陸，余病新愈，體頗虛弱，又兼倫敦遊記概未整理，欲再緩一週間。攀、猶頗不以為然，大起反對，余已決定如是，彼兄弟雖反對亦不之聽也。

此外，「新九月二十三日，攀、猶招余往海濱散步，余因欲作遊記，故不同行。」以及「新九月二十九日，余盡日不出門，寫〈保羅寺遊記〉²⁰。」等則，皆呈現

¹⁷ 許雪姬，〈反抗與屈從——林獻堂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九期，（台北市：政治大學，2002年5月），頁283。

¹⁸ 《灌園先生日記》（一），昭和2年8月25日，頁175。

¹⁹ 陳秋逢發表於《台灣民報》的文章有：〈讀昭和新聞〉238號、〈我們的思想統一觀〉252號、〈讀黃石輝氏的有望的思想統一觀〉261號。

²⁰ 〈保羅寺遊記〉發表於《台灣民報》196號，昭和三年二月十九日，（七）。

林獻堂重視撰寫遊記的程度，並具補充日記不足的效果。他早在旅行前即已閱讀過康有為與梁啟超的遊記，閱讀的記憶迴繞於書寫之際，或許產生欲超越前行遊記的使命感，不只為台灣人觀看世界，並將心得分享於讀者的眼前。此外，整部遊記常出現眾多詳細數據，如列出英國議會中保守黨、自由黨、勞動黨、立憲黨、愛爾蘭北部國民黨、獨立黨、共產黨及無黨籍的人數；或是羅列出歐美各都會的經緯等地理位置，以及一年的平均氣候、人口數據等資料。另從遊記中所記英國的重要三條憲章，或是各地的代表性建築、各國歷史發展脈絡以及文化活動看來，皆可見林獻堂蒐集各類龐多文獻資料，作為撰寫遊記參考用心的情形。

休閒旅遊是以自願的態度、選擇的自由、以及內在意義的感知為核心條件與主要內容，與馬斯洛所說的「自我實現」有其相似之處。休閒被視為是一種主觀的體驗，是個人參與活動時，在其活動的物質環境與社會場景結合構成的空間中所處的情境²¹。林獻堂出國旅遊一年，歸途中又停留日本八個月。總計一九二七年五月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共一年八個月中，未嘗涉入台灣政治活動²²。但是他的日記和遊記中，並沒有不得志的感嘆。環遊世界是林獻堂自我沉澱、開展思考廣度的自覺活動，在需花費龐大旅費的旅程中，以日記體或遊記體抒發他的旅遊體驗。體驗是指個人經歷了一段時間或活動，並對其感知進行處理，是與當時的時間空間相聯的精神過程²³。林獻堂一九二七年日記與遊記互補，共同為此趟歐美之旅，留下個人的生命感受和體悟。

三、世界歷史記憶的再現

當旅遊者書寫歷史場景時，空間就成為記憶的國度²⁴。歷史總是敘事出來的，歷史有許多不連續、充滿矛盾的縫隙。史學家對於過去的研究，不能再宣稱是超然客觀。我們無法超越自身的歷史情境，我們所面臨的過去，不是實質

²¹ 德森等著，劉耳等譯，《女性休閒——女性主義的視角》（*Both Gains and Gap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Women's Leisure*）（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1-18。

²² 張正昌，《林獻堂與台灣民族運動》（台北：作者自印，1981年），頁208-209。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4年11月）。

²³ Kelly John R. 著，趙冉譯，《走向自由——休閒社會學新論》（昆明：雲南人民，2003年），頁2；謝彥君，《旅遊體驗研究：一種現象的視角》（天津：南開大學，2006年），頁10。

²⁴ Mieke Bal: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p. 137.

的客體，而是從所有各式各樣已成書的文本中所建構出來的，亦即文本的理解符合特殊的歷史考量。文學與歷史之間的關係必須再次重新思考，沒有穩固的「歷史」可被視為「背景」來襯托出文學²⁵。歷史事實的描述，除作為「記史文本」的特殊性外，亦帶有一般「敘事文本」的基本特質。某些觀點所涵攝的歷史圖象，甚至成為集體記憶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林獻堂於旅遊書寫中常興起懷舊（Nostalgia）的情緒，在他參觀古蹟、歷史場景後，多藉由日記與遊記再現這些有關異國的歷史記憶。

遊記中所載參觀紀念館等文化活動時，常關注於群眾的集體記憶。如：愛丁堡城的王宮兵房前有一間大戰紀念館，但是館中的紀念物，僅有與蘇格蘭軍隊有關的展覽品而已。當日各隊的軍旗及戰死者的姓名皆詳列而無遺漏，有位婦人觀看到親人的名字，不禁眼淚滂沱、嗚咽很久。林獻堂於是發出感嘆：「戰爭究竟所為何事，而戰勝者至今猶有餘痛；若戰敗者，則不知將何以慰其悲哀淒愴之懷也²⁶。」經歷戰爭的人內心常留下傷痕，即使戰勝者長久以來猶有餘痛；而戰敗者所感受到的悲哀淒涼，外人更不知如何加以慰藉。在戰爭遺跡方面，林獻堂曾前往伊泊爾去踏訪當時戰況最激烈的戰場，見此地的市街樓房皆是新建，可知兩軍的炮火猛烈，致使當時無一完好建築。德軍有三次的大舉進攻，其中一次英軍提防不及，遭德軍毒瓦斯攻擊。四年之中英軍死者共五萬六千人，含殖民地的士兵，總計約有十五、六萬人。英國政府建造一座紀念門，門上立一雄獅，門中則刻五萬六千人死者的名字，對於殖民地之兵則一概不理，林獻堂認為這令人匪夷所思²⁷。戰爭紀念館通常以照片、文物、模擬歷史場景的模型等再現戰爭歷史記憶。亦運用大量的「真實」物件，如戰爭前的背景、戰爭之爆發等，以建構其對戰爭的感受，展示便形成隱藏的權威（hidden authority）²⁸。透過各種情境與氣氛的模擬，重構歷史場景，使讀者有身歷其境的感受，並視其為「事件」的再現，以引發哀悼之情。而紀念門或紀念碑上以雄獅作為英勇的象徵，卻刻意

²⁵ 雷蒙·塞爾登（Raman Selden）等著、林志忠譯，《當代文學理論導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年8月），頁237-238。

²⁶ 林獻堂，《環球遊記》，頁32。

²⁷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頁233-234。

²⁸ 陳佳立，〈生命中不可再現之痛：論戰爭紀念博物館之展示與敘事策略〉，《博物館學季刊》第21卷第1期（台北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7年），頁46。

排除了從殖民地調至戰場而犧牲的士兵。戰爭紀念門上英國權威地刻上「為國捐軀者」名單，正顯現英國殖民者選擇性的歷史記憶，與傲慢統治者的遺忘。

另外，他又參觀位在由布魯塞爾至滑鐵盧古戰場間的英軍大將惠靈頓的居所。當年拿破崙逃出厄爾巴島後，不久便匯集了十多萬的兵力，英國便命令惠靈頓率領大軍至滑鐵盧，激戰過後拿破崙的軍隊全軍覆滅。之後拿破崙再被放逐於大西洋中的聖赫勒拿小島，五年後便辭世。在戰役中比利時貴族奧倫治公爵亦犧牲，後人築土為丘，形似埃及的金字塔，丘上立一獅，作為紀念。在這曾經冠蓋雲集的戰場中，如今卻徒留一片荒蕪，林獻堂於是有所感懷：「嗚呼！所謂一世之英雄也，而今安在哉？」並提到小說家囂俄²⁹（Victor Hugo）欲記錄這段戰爭的經過，便親臨現場。當時他居住的旅社，如今成為日後到此戰場者必須遊覽的場所；昔日默默無名的小說家，卻成為了人人敬佩的英雄。林獻堂藉由書寫不同人物的際遇，以思考所謂「英雄」的歷史定位。

《環球遊記》中詳細描寫參觀活動中所見的銅像，提到：德意志聯邦城中的愷撒街之南有裨斯麥銅像，背後有一女神，冠上有鷹，此為德意志的代表。女神騎在馬上，右手執旗、左手按轡，馬蹄下方有尾形似鱷魚，以象徵惡魔。而裨斯麥左手執刀，右手策馬首前進，氣象雄壯，令人想見當日之威風。另一端有紀念歐洲大戰的銅像，仍是一女神，右膝跪地，左手掩面呈現悲哀哭泣的模樣，題曰「為犧牲者」³⁰。兩個銅像相對聳立四十餘年，然而戰爭依舊是那樣殘酷，又令林獻堂聯想到軍國主義的窮途末路。另外，在柏林市中央廣場有威廉一世的石像，兩旁的右側為第一任總理亞柏特，左側為現任總理興登堡。當大戰開始之際，德軍傾全力攻打法國，並且直逼巴黎。不過，東普魯士的邊防較弱，俄軍乘虛而入，威廉二世命令興登堡做東普魯士的總司令，後來興登堡大破俄軍，並進而攻陷波蘭首都華沙。德國人民稱頌其功業，並形容他：「上帝於此大戰之際錫吾民以大將」，可見人民對他的欽佩推崇的程度。林獻堂以為今日此大將貴為總理，又可察覺出德人軍國主義復萌，以及強烈的報復心³¹。林獻堂不僅仔細刻劃銅像的外貌，並發掘它的象徵意義，且補充許多歷史背景資料，呈現他對異國歷史記憶的再現。

²⁹ 囂俄：今譯為雨果，Victor Hugo。

³⁰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頁 201。

³¹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頁 215-216。

林獻堂所提到的銅像不僅是軍事上、政治上的類型，也有宗教家、藝術家的銅像。如在宗教家的銅像塑造方面，位於亞爾然丁的耶穌銅像，手持十字架以表示犧牲與博愛的精神；他認為若有此精神，世界和平才可能實現，否則只是流於空談。此外，在荷蘭鹿特丹最大的建築就是市政廳，市民最常誇耀十五世紀末大學者伊拉斯莫斯，因當時宗教大革命家的路德馬丁即是受到伊拉斯莫斯的影響。其銅像離市廳不遠，所有外國人來鹿特丹多前往拜觀。又如荷蘭三大畫家在世界上頗為著名，許多大都會中的美術館皆有其畫。林布蘭是三大畫家之一，他生長於阿姆斯特丹，在市中心有一座市民為他而立的銅像。在西方為藝術家立銅像是十分常見的，如英國的哈拔忒黎是個唱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名劇的演員，因為其戲劇的成就，英國政府為他封爵，更在大街上為他立銅像。林獻堂於是發出感嘆：西方人對藝術家是如此崇敬，他們在藝術上的成就，絕非偶然。反觀東方人所立的銅像無非是軍事家或政治家，也難怪藝術領域無法有所進步³²。在旅行過程中，常常是一種自我和他人再現心理機制，比較、參考與對照別人文化社會而顯現出人我之差別³³。林獻堂到西方國家處處見到各領域代表性人物的雕像，發現當地是重視藝術的，而東方所立銅像卻非軍閥即官僚³⁴多關注於軍事或政治。這種對照在異國地方時空的迴映鏡景中顯得特別突兀，人我關係因此有另一種面向重新呈現，在心理機制上會留下重要印記。以西方對繪畫及表演藝術者的肯定，及東方對鞏固軍權勢力的宣耀，如此比較、對照而反思東西方文化特質的相異處。

在具有代表性的建築物描寫方面，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聯盟會議廳，落成於一九一三年，但隔年便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經過戰爭的洗禮後，世界各國又重倡和平博愛的精神，並將會議廳由海牙移於日內瓦。在日內瓦，英、美、日三大海軍國召開會議，討論軍備縮減的議題，但因意見不合導致談判破局，削弱國際聯盟維持世界和平的地位。雖然，在數百年之間和平的理想未能實現，但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場地，足堪為後人憑弔³⁵。至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³²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頁 215-216。

³³ 廖炳惠，〈旅行、記憶與認同〉，頁 89。

³⁴ 林獻堂，《環球遊記》，頁 123。

³⁵ 同註 32，頁 228。

於德軍佔領的四年當中，市民十分團結，市長及議員亦盡力維護地方安寧與秩序，受惠的群眾不下數十萬，可謂居功厥偉，在市中心的街道便是以市長及議員之名來命名的。林獻堂再現這些建築物或街道得名的緣由，又介紹在世變之下國際組織或領導人物，除了突顯這些歷史場景上所具的紀念意義以及闡述社群組織或社會菁英的影響力之外，也蘊含對世界和平的企盼。

林獻堂在〈法國見聞錄〉「康科特廣場」一節中，望著近在咫尺的斷頭台，憶起當年路易十六上斷頭台之時，仍神色不變高呼「法民聽朕言，朕今無罪就死」的模樣。感嘆路易十六非昏庸無道至極之君主，然亦不免一死，實見民眾極度厭惡專制虐政的侵擾，不是從革命之日才開始的。此外，林獻堂也因上位者未自覺長期漠視人權與民間疾苦，感到沉痛的傷悲。他描述其後革命黨人的互相殘害，領袖人物羅蘭夫人也走上臨刑末路，死前道出「自由！自由！世間借汝之名以行罪惡，正不知多少也」的心酸情緒。廣場中的噴水池，在林獻堂眼中是無數志士仁人的沸騰熱血，噴之不盡，亦如他對恐怖法蘭西統治時代的不勝唏噓。在「凱旋門」一節中，則提到拿破崙當日作此門是為紀念自己的武功，豈知尚未落成，卻已被放逐於孤島中，直到一千八百年後路易腓力（Louis-Philippe）才完成此建築。林獻堂仔細觀看凱旋門的雕刻，包括拿破崙參與的一百七十二回大大小小戰役，及三百八十六位將軍的姓名，然對於這些霸業的圖象與文字紀錄，卻有不同的觀照。他主張「戰爭需紀念戰敗，不可紀念戰勝。」認為因為紀念戰勝，其國民必驕矜自滿，以為天下無敵，而更容易招致失敗，凱旋門即是一個顯明的例證。另外，林獻堂在遊記中補充戰敗更需要被紀念，民眾才會臥薪嚐膽、同仇敵愾，國家才有轉敗為勝的一日，就如同康科特廣場女神服喪的例子³⁶。十一月十一日是平和紀念日，法國自大統領以下皆來參拜，林獻堂在漫遊歐洲後又及時參觀此典禮。這些儀式甚為莊嚴，軍隊排列兩行，以二百五十枝軍旗圍繞其墓，號炮一聲，奏悲哀軍樂，於冷雨寒風之中，使參觀者感染沉重哀淒的氣氛。到異地旅遊時常引發或異國情調記憶（Exotic Memories）的情感反應，林獻堂在這些古蹟與紀念物中，感受到法國追求自由、和平的歷史軌跡，亦引發他對文明的另類思考。

³⁶ 林獻堂，《環球遊記》，頁43-45。

在旅遊過程中，林獻堂安排參觀許多的博物館及美術館。他到英國，體驗到處處是博物館的況味，「大英博物館之外，尚有繪畫美術館、肖像美術館、動物鑛物標本博物館、維多利亞女王紀念館、華勒斯美術館，欲悉數之尚恐未能盡。」英國博物館的數量、種類在世界名列前茅。《灌園先生日記》詳述大英博物館的閱書室，藏書有八萬五千部，可容六百人，屬於博物館之書籍計有五百萬部。《環球遊記》又加上「僅此一點，亦足以誇耀於世界³⁷。」帝國冊數驚人的藏書雖保存文化資產，也是向世界各國獵奇後的展示。遊記中大英博物館還包括蒐羅了埃及希臘羅馬雕刻、南非、南美蠻族之物，以及中國書籍，例如手抄莊子〈逍遙遊〉及《論語》等唐朝古物。林獻堂遊記提及曾前往此館兩回，遊記中依舊發出「可惜猶未能遍觀³⁸」的慨嘆，大英博物館典藏文物的多元樣貌，令他親眼目睹帝國蒐奇勢力的廣闊。旅遊除了是跨界移動之外，也是觀察異文化的最佳時機，透過文化差異的刺激，進而能反身思考。如林獻堂在參觀博物館時見路易十四時代的鞋頭非常尖小，長僅四吋餘，後跟高三吋，「實無異漢族婦女的纏足，以婦女足小為美觀，不意中西人如出一轍³⁹。」作者在觀察異地風俗，卻發現昔日東西方身體觀的相仿。

又如參觀英國泰晤士河附近一處溫座爾古城中的禮拜堂，為當時在位英王喬治五世所擁有，當英王不在此居住時，則開放進入觀覽並酌收參觀費，又將此筆收入，寄附於治療貧民的病院。林獻堂見其經營制度，認為「其開放如是，其善利用亦如是⁴⁰。」這樣的管理模式，也是他這趟旅行的目的之一：能觀摩西方現代的制度，傳播旅行訊息到台灣。十八世紀博物館開始發展為公共機構，而最早的現代化國家博物館是大英博物館，在一七五三年由英國國會決議設立，一七五九年在布倫斯堡的蒙泰館以科學研究的機構受啟用，其中牛津的伯爵哈立（Robert Harley）的手稿，建立了博物館的基礎。一七九三年法國羅浮宮的皇家收藏正式對外開放，這可以視為一個重大的里程碑，羅浮宮成為了法國的象徵，所有人皆可於參觀日進入。隨著越來越強的公民意識以及國家觀念，

³⁷ 林獻堂，《環球遊記》，頁 26。

³⁸ 同上註。

³⁹ 同註 37，頁 49。

⁴⁰ 同註 37，頁 22。

所謂的「國家博物館」相繼成立，這可視為當時的風潮⁴¹。林獻堂書寫這些展示性質的場所，除了呈現歐美各國蒐羅展覽品的文化風潮外，也是重新改寫歷史的手段方法。什麼樣的文物是應該被看的，什麼的形象是應該被遮蔽的，這背後即牽涉到殖民霸權的選取標準，而在被看與遮蔽之間，各國的形象以「與原先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現在參觀者面前，歷史記憶遭到帝國策略性的修改。博物館不只是展示國家實力與形貌的象徵符號，同時也藉由文物的蒐羅映照了大眾生活變遷的軌跡。帝國將原本雜亂無章的落後世界，以抽樣的、選擇性的方式呈現一個具有理性秩序的空間，而館內所有的事物經過挑選展示後，再重新編撰出一套西方人的想像歷史。林獻堂參觀各類博物館時，未能批判帝國掠奪的不當之處，自有觀奇視角的受限。然因為書寫實地走訪的所見所思，故呈現作者再現西方博物館的蒐藏史。

四、日記與遊記的文化啓蒙論述

「啟蒙」在文化與歷史上有其發展的脈絡，啟蒙運動實為一種心智狀態，人的價值開始以自我為出發點來加以肯定，也就是以人作為人的價值的主軸。從人類的精神心路歷程，邁向完整的自我瞭解、個人的自由啟始，同時也蘊含進步科技以及理性批判，並尊重人權自由的世界觀⁴²。林獻堂的日記除了記錄瑣碎的生活事件、或是參觀古蹟或博物館等文化場域之外，他的日記中亦流露他對公共議題的關注。《環球遊記》是將身歷其境的感受，以旅遊見聞的敘事方式，透露出於公共媒體上發表的啟蒙論述。林獻堂於英國公園中常見演講活動，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他曾在海多公園聆聽宗教、政治、經濟等議題。日記與遊記中皆詳細描述印度人與共產主義者，以「堂堂之態度」攻擊政府的情景。遊記提到：

印人攻擊印度政府之橫暴殘酷，虐殺無辜，蹂躪人權，皆引事實以作證明，數百聽眾，待其講完，質問之聲續出，有一人問印度政府既如是之橫逆，印度軍隊何以不叛亂？答之曰：軍隊之不叛亂，以待時機而已，

⁴¹ Friedrich Waidacher 著，曾于珍譯，《博物館學——德語世界觀點》（台北：五觀藝術，2005年）。

⁴² Norman Hampson 著，李豐斌譯，《啟蒙運動》（台北：聯經，1984年），頁145-149。

汝勿謂軍隊不叛亂，就是好政治也。聽者雖有反覆辯難，余深服其縱容不逼，無怒色，不作無禮之言相嘲誹，真有大國民之襟度也⁴³。

《灌園先生日記》又提到有兩處豎紅旗講社會主義，他記錄四個要點，包括：批評現今議會的功能不如公園的演講活動、質疑首相與大臣的能力，以及若使社會經濟均衡，則可解決八成少女墮落的問題等。公園的演講活動亦是一種「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為構成公民社會種種制度上的條件之一。當代社會學者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所提出的「公共場域」，除具有社會空間的概念外，也有群體一起建構出公共理念的抽象意義；亦即強調人與他人的互動，透過論述來與別人達成共識。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即經由融合各種意見，達成彼此認同的共識，而形成公共政策上的參考，此即是延續到十九、二十世紀民主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⁴⁴。林獻堂在《環球遊記》中如此評論演講活動的盛況：

每談一段，千數百的聽眾喝采贊成之聲不絕於耳，有警察四五人，搖搖而立，概不干涉，真是言論自由⁴⁵。

林獻堂對於這些演講活動感觸頗深，所以在日記與遊記中皆有多處詳細的描寫。回顧台灣自二十世紀初以來的啟蒙運動可說是風起雲湧，其中台灣文化協會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在台北靜修女學校(今靜修女中)成立，林獻堂即獲推為首任總理。協會的成立是以「文化啟蒙」台灣人為出發點，最終的目的是期望台灣民眾在政治意識上能覺醒，促成民族自決運動。因此所舉辦的活動皆是以推廣教育性質的文化活動為出發點，達到啟蒙普羅大眾的目標。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以來所舉辦的活動，最重視的莫過於文化演講。演講是文化協會活動中主要的核心，其效果比任何活動更具有力量，直接與民眾面對面更能引起民眾共鳴響應。然而，這些演講活動卻屢遭總督府的干涉，茲以表二及表三整理演講解散及中止的情形：

⁴³ 林獻堂，《環球遊記》，頁25-26。

⁴⁴ 哈伯瑪斯所指的「公共領域」的概念，可追溯至十八世紀在英國的咖啡館、茶館，以及法國的沙龍、德國的藝文辯論，當時中產階級多在公眾活動空間中面對面討論書籍及新聞資訊。十九世紀末因越來越多人想參與公眾事務，且因報章雜誌等傳播媒體的出現，致使公共場域有轉型的趨勢。Jurgen Habermas(哈伯瑪斯)、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台北：聯經，2002年3月)，頁35-67。

⁴⁵ 同註43，頁26。

表二 演講及解散處份次數

州名	講演次數				解散處分次數			
	1923	1924	1925	1926	1923	1924	1925	1926
台北	4	51	99	97	3	11	4	10
新竹	—	—	22	68	—	—	1	15
台中	25	47	103	27	2	1	1	1
台南	6	34	67	88	—	—	1	3
高雄	1	—	24	35	—	—	—	6
計	36	132	315	315	5	12	7	35

表三 辯士人數及中止處份次數

州名	辯士總人數				中止處分次數			
	1923	1924	1925	1926	1923	1924	1925	1926
台北	17	84	180	213	7	9	5	19
新竹	—	—	132	361	—	—	10	61
台中	146	265	541	167	11	21	31	24
台南	45	83	283	266	1	6	18	16
高雄	6	—	119	173	—	—	—	37
計	214	432	1165	1180	19	36	64	157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年），南天書局複刻本，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頁151-152。

在當時現代知識尚未普及的情況下，讀報社的文書宣傳效果較為有限，因此以講演會來對大眾宣講是最快也最容易收到成效的方法。在文化協會成立之初，講演會的場合並不多，只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重要城市舉行。直到一九二三年會員黃呈聰、王敏川以台灣「民報記者」身份返台，推銷「台灣民報」時順便作巡迴講演，內容提及民族主義以及對台灣統治者的誹謗等議題，引起了地方民眾熱烈的反應。文化協會發覺講演會的影響效果，才開始頻繁的到各地舉辦⁴⁶。從表二、表三可見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演講次數不斷增加，然而，遭到解散與中止的次數也有增加的趨勢。所以曾參與

⁴⁶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年8月），頁344-351。

台灣文化協會演講活動的林獻堂，能自由地在英國聆聽公園內的演講時，不免感慨萬千。

至於林獻堂在泰晤士河畔議院旁聽的經驗，使他有了另一個觀摩民主制度的機會。當他參觀早發展世界議會政治的英國上下兩院後，記錄下一千二百十五年前重要的三條憲章：一、無故不得逮捕人民、非經法庭宣佈不成罪名、以及特別徵稅須得貴族會議許可。他又提到對政治制度的論述：「若以吾人現在之眼光觀之，實是平凡無奇。那知當日人民欲求此些少自由，非至以干戈相見不可，於此當可以想見當時專制之酷虐也。」他認為約翰王知不可違逆民意，故接受民眾的請願而發佈憲章，所以相安無事。但查理士卻逆行民意，因他專制的權威，最後卻落得悲慘命運。林獻堂於是感嘆道：「不知世間當權之人，何故學查理士一世的覆轍者何其多也？真是令人不解。」⁴⁷林獻堂父子三人的環球之旅並非只是欣賞風景，他們經常前往公園聽演講，再加上參觀議會等行程，呈現欲親身體驗民主制度的欲求。但林獻堂此篇〈英國見聞錄〉後來又刊登在《南方》雜誌，但因多處表達對英國諸多制度的讚賞，而引發「《環球遊記》事件」⁴⁸。此次事件透露出台灣總督府介入遊記書寫壓制與操控的情況，同時更突顯林獻堂於原遊記中所寄託的象徵寓意。

雖然林獻堂一九二七年未接受台灣府評議員的職務，但當他見到英國當時有八位女議員⁴⁹，又參觀英國皇家自動車俱樂部，曾仔細觀察考察其組織設備和運作規章，令他有頗深的感受。他認為「凡要視察其一國之政治，倒不如視察其自治之小團體，國家是自治團體放大做成者，若自治小團體做不來，未有國家有良好之政治也。」日後林氏父子回台灣即效法組織團體，先是成立無名會，後來組成的一新會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自治團體。一新會固定在每週星期六晚上七點半或八點半舉行演講，稱為「土曜講座」，頗受民眾歡迎。第一次的演講聽眾有三百至四百人，其後聽眾大約維持百人以上。如五月十四日楊水

⁴⁷ 林獻堂，《環球遊記》，頁 19-20。

⁴⁸ 《環球遊記》於《南方》刊載其間，發生所謂的「《環球遊記》事件」。1941年4月到1942年6月1日期間，正好連載〈英國見聞錄〉。其中對英國大力讚賞的部分引起了日本官方的不滿，尤其當時正進入太平洋戰爭的緊迫時期。為求免禍，林獻堂辭去台灣總督府評議員及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與等公職、停止《環球遊記》的繼續刊載，並且接受台中州廳見森田俊介知事建議，書寫〈十五年後之感想〉一文刊載於《南方》上。

⁴⁹ 林獻堂，《環球遊記》，頁 20。

心和蔡培火的日曜講座，吸引約兩百名聽眾；十二月十日林獻堂和夫人聯袂演講，「聽眾百餘人皆肅靜傾聽」⁵⁰。七十餘年前對於深居閨閣的女性而言，公開演講絕非容易的事。公開演講面對的是一群聽眾，講者不論是議題或儀態，都得從日常的「私的關係」中掙脫出來。一新會的土曜講座（後稱日曜講座），定例每次二人演講，一位男士，一位女士。這個原則一直持續到最後，顯然林獻堂、林攀龍等人對女性的能力具有信心。如第一回的土曜講座，即由林攀龍〈就社會事業而言〉和張氏月珠〈促進婦人之精神〉共同負責首次演講⁵¹。四月二十三日張月珠向林獻堂提議創立研究會以養成女辯士，林獻堂「甚贊成其說」，認為這樣做有助於改變一般人對婦女及其地位的看法。林獻堂與二子環遊世界回台後，即實際藉由這些自治活動而實踐其理想。

林獻堂對於巴黎情有獨鍾，他多次出入巴黎，並於遊記中寫下個人對此都會的感受：

「光明之巴黎」一語，係十九世紀大小說家囂俄 Hugo 之言，他所謂光明者，不僅物質美麗而已，科學文藝種種亦莫不由巴黎而出，如光月照遍世界，故謂之曰光明之巴黎，雖然光明總是亦有黑暗，但余所觀光明居多黑暗較少⁵²。

他認為巴黎市街不僅是整齊美麗而已，如諾脫爾達摩大寺院（Potre Dame de Paris）、盧甫耳（Muse'e du Louvre）、舊宮殿（Palais Royal）、市廳（Hotel de Ville）、凱旋門（L'Arc de Triomphe）、康科特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皆有歷史的關聯，足以引人深思。巴黎不僅是法國的首都，且是國際的都會，自十二世紀學術昌明，各國之人大多來此留學，而各國王侯之宮室、衣服、飲食亦莫不學於此，故巴黎之一舉一動莫不影響全歐，國際的都會的稱名實始於此。他特別描述未到巴黎之人，每常懸想巴黎是一個花團錦簇之都，而住在此花團錦簇都中之人，必定奢侈荒淫無度，林獻堂認為奢侈荒淫只是少數而已。若大多數之人則皆樸素儉

⁵⁰ 周婉窈，〈「進步由教育 幸福公家造」——林獻堂與霧峰一新會〉，《台灣風物》56 卷 4 期，（台北市：台灣風物雜誌社 2006 年 12 月），頁 52-56。

⁵¹ 輯自《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見《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正文前的圖版部分。

⁵² 林獻堂，《環球遊記》，頁 42。

約，與想像有相當大的區別。然亦有幾條街花天酒地、跳舞達旦，大多是供作外國人之娛樂場、消金窟，他認為這就是光明之巴黎，其中一點的黑暗。林獻堂藉由西方政經與教育制度等層面的觀察，記錄下個人對異文化的見解。

在經濟方面，七月二十五日的日記提到：失業勞動者數千人聽聞街道欲修繕，但等候終日卻依然無工作機會，林獻堂為這種境遇發出「實堪同情」的關心。十月十七日的日記提到，德國人製樟腦已成功，與天然樟腦比起來並無差異。現在因德國製造方法為秘密，製造費亦高，故不能與天然的樟腦競爭；但若漸加改革，使生產費低廉，將來台灣樟腦必受打擊⁵³。林獻堂返回布魯塞爾後，正值比利時國民發起要求政府稅金減輕的聯合示威運動，圍觀者大約有好幾萬人，街路擁擠無立錐之地。他們的要求有三大點：一、減輕納稅；二、酒類販賣的自由；三、咖啡店夜間不限鐘點。這三者之中，林獻堂只認同減輕納稅而已。那時咖啡店所賣的皆是薄酒，如麥酒等類，而威士忌、白蘭地則不准販賣，以防消費者飲酒過量胡亂生事，此類的限制實為恰當。咖啡店的營業時間以半夜一點鐘為限，若將營業時間改為無限制，社會的衛生、秩序方面將會有所影響。英國的茶店僅供飲茶、用餐，若欲飲酒須前往酒店或餐廳；德法的咖啡店可以飲酒、聽音樂，任人消遣，甚至有舞廳；荷蘭、比利時的咖啡店更可以賭博，若不限制營業時間，所有的娛樂活動都通宵達旦，將對社會造成莫大的傷害。若以「論述」的概念來分析其旅行見聞，將發現在某些特定的觀念、語彙及各種再現的形式中，都具有一致的論述對應印記（discursive register）。論述主要關切的是分析再現的形式、再現如何被構築出來、再現包含了什麼設想——如種族或中心主義，以及再現投射出什麼樣的意識形態等⁵⁴。從日記與遊記的敘事中，得知林獻堂鼓勵文化消費，但卻持保守的心態。這些評論都會文化的再現，流露他重視傳統養生之道，以及投射出便於管理為主要考量的統治意識。

在教育方面，林獻堂觀察到英國學校的教育著重與家庭聯絡，兒童每週皆住學校，聽教員報導其學業成績與品行優劣，如果有缺點回家再認真教導，以

⁵³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頁 208。

⁵⁴ Robert J. C. Young 著，周素鳳、陳巨擘譯，《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導引》（台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國立編譯館，2006 年 1 月），頁 395-399。

補其不足⁵⁵。這些英國式的教育制度，不只關注於知識性的傳授，也督促學生的品格教育。同時，著重於學校與家庭的聯繫，因而更能發揮教育的功效。《環球遊記》又提到：英國人沒有一人不識字，幾無一人不讀新聞，故其國民皆略能洞悉世界大勢，比他國的國民較為進步，這些皆是閱讀新聞所發揮的功效。「故凡欲知其一國國民的智識程度之高低，試先查其能否讀新聞的人數之多寡，然後判斷其智識程度之高低，諒當不至大謬也⁵⁶。」一般而言，口耳相傳的民俗故事、迷信、盲從的習慣被「消息」(information)所取代，便是啟蒙運動的開始，而經常閱讀的習慣也是邁向這條大道的一步⁵⁷。一九二一年一月台灣文化協會成立讀報社，成立目的是為了讓無閱讀能力的民眾能接觸到外界的訊息；而另外一個目的是突破總督府對言論的管制。當時總督府打壓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台灣民報」，購買或閱讀台灣民報常受到警察的注意，讀者有時因此不得不放棄購買，設置讀報社既可讓無經濟能力的民眾閱讀，也能讓有能力閱讀的民眾遠離警察的干擾。讀報社分別於台北、新竹、苗栗、竹南、彰化、員林、斗六、嘉義、台南、屏東各地成立，可惜後來因經費問題而逐漸縮小規模，終至停辦⁵⁸。林獻堂因參與過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所以也關注於以閱讀新聞作為判斷國民識字率的面向。

林獻堂的遊記談論各地風俗時，觸及到日常生活態度與價值觀等精神面的主題，並關係到人類社會活動背後的複雜心理結構。例如：比較法國人與英國人對於星期日的生活態度：英人是絕對休息，法人則是全家至公園遊玩，同享天倫樂事⁵⁹。《灌園先生日記》十一月五日記載：「比利時東鄰德意志，南鄰法蘭西，多事事學法蘭西，而不學德意志。」林獻堂認為比利時的國民性活潑、愛自由，與法國國民性相近，而法國的文化又最早發展，所以值得效法。比利時為其自由與獨立，雖居於弱小的地位，亦不惜犧牲一切加以保衛，若以東方人之眼光必笑其愚，認為得不償失，如果換成是他則情願將土地借給人家作戰場，而自己則在其中望收漁人之利。「東方人所愛者是利，西方人所愛者是自由，

⁵⁵ 林獻堂，《環球遊記》，頁 35。

⁵⁶ 同上註，頁 27。

⁵⁷ Norman Hampson 著，李豐斌譯：《啟蒙運動》(台北：聯經，1984 年)，頁 142。

⁵⁸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 344-347。

⁵⁹ 同註 55，頁 52。

愛利之人若以利誘，則為奴隸亦所甘心；愛自由之人則不自由毋寧死，此則東西之所大異之點。」知識與信仰影響人觀看事物的方式，林獻堂在環球過程中，不單單是觀察與記錄西方的特殊文物，同時也藉由實地觀察，想像各國的民族性。並相互比較多元文化，有時則經東西方比較的機制，以突顯文化差異，更使旅人確立自我與自己的文化價值。

對於英國醫療制度，林獻堂也曾提出個人見解。他認為因當地醫院的設備非常完善，富人生病，不愁醫療費的支出；而窮人生病，可以免費接受治療。一般醫院的醫療服務只針對弱勢族群做全額補助，若是中產階級不幸患有慢性病，常遭遇到困境，因治療時就得付出龐大的醫藥費。由此可見，英國當時的醫護制度仍無法做全面性的關照。林獻堂因此有感而發，引古人所說：「不可養癰成患」，他認為其實不只是治病而已，全天下的事情都是如此⁶⁰。許多針對貧病群眾設計的醫療措施，多出自人道關懷與提早預防的考量。十九世紀出現專為貧窮的病人而設的施藥所與醫院，其開銷有賴於教會或世俗團體募得的捐款與政府補助的經費。一八三四年英格蘭通過新濟貧法，貧工病院免費收容了大批貧民，成為英國全民健保的張本⁶¹。若參照台灣民報上所載的醫療制度，則看出當時對不公平制度的批判：「我們以為台人無端受這個差別待遇，於保健上實在有很大的損失。又知道這在台灣統治上也很有關係，所以不得不鄭重在這裡提出警告。其內部的設備和人員的配置，以及一切對患者的待遇，可以決定台北醫院完全是為日本人而設的，把大多數的台人置之不顧。難道是真正如一般人所說，台北醫院是為獎勵移民而設的嗎？」⁶²在林獻堂的日記與遊記當中，提到了關於自身健康的敘述，而當時的台灣社會也正提倡著衛生健康的觀念，或許，他想藉此更加推廣社會的健康醫療制度，並點出台灣社會醫療福利的不足。

從有關認同與文化歸屬的心理機制面向，探討旅遊過程中如何思考自己的認同位置。為什麼別人可以而我卻做不到？為什麼他國可以公開自由演講，但殖民地的台灣卻處處受到限制？為什麼他國有議會制度，但我們向東京多次請

⁶⁰ 林獻堂，《環球遊記》，頁 38。

⁶¹ 若伊·波特 (Roy Porter)、王道還譯，《醫學簡史》(台北：城邦文化，2005 年)，頁 233-234。

⁶² 鄭志敏輯錄，〈官、公立醫院的改造〉，《日治時期台灣民報醫藥衛生史料輯錄》(台北：中國醫藥研究所，2004 年 12 月)，頁 96。

願卻遭致失敗？為什麼他國從事藝術文化工作而有貢獻者，多立銅像紀念；但我們的銅像卻都是軍事家、政治家？自我認同的重新調整過程中，將發現本土和其他地區的微妙差異，所以心理機制將外面的景觀及所引發情緒變化，以書寫方式顯現內心裡的人我差異。而在差異的比較過程之中，就會產生有關本土政治、經濟、社會種種文化現象的批評距離、不同的觀點，也就是文化批判的位置，了解到自我中心為閉塞無知的結果。所以會發展出比較國際觀（comparative cosmopolitanisms），透過都會間的比較發現自己的不足。十七世紀許多法國思想家就針對東西方的差異提供借鏡，對自身的文化採用批判性眼光加以反省，這就是所謂的文化批判。旅行會引發認同的危機以及文化都會觀，使我們透過比較、參考與學習過程中，修正自己文化中的缺點，進而擴充自己的視野⁶³。而台灣屬於文化文流領域相當特殊場域，處於日本殖民時期的林獻堂，長期關注台灣的社會文化現象，此次環遊世界的旅程更促使他開拓書寫的面向，發展出深具個人風格的文化啟蒙論述。

五、結語

人類思想的進步與發展，必須對各文化及其精神加以理解、融合與超越。法國年鑑學派將理解（comprehend）視為研究的最高境界，著重對歷史結構與現實的複雜性及其各種內部、外部連繫的深刻認識，依靠這種理解，歷史才能與現實建立真正的連繫。林獻堂為當時的知識菁英，於台灣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其日記不僅因牽涉眾多事件而具有歷史厚度，且蘊含個人的思想關照。有別於回憶錄及口述歷史，其日記為當時人記當時事，可補充官方資料的不足，史料價值極高。此外，他又是日本殖民時期首位遠至歐美多國旅遊的台灣知識分子，遊記所錄旅途時間之長、空間移動之廣，當時難有台灣人能超越他，更增添他的旅遊書寫所蘊藏的學術研究價值。

林獻堂日記與遊記雖然就其內容題材上有高度的相似性與重疊性，但兩者的寫作手法有所差異，也呈現從私領域到公領域的過程。他的日記大多為簡略

⁶³ 廖炳惠，〈旅行、記憶與認同〉，頁 89-91。

記載的札記，後來再擴寫成一篇篇以地點或事件為題的遊記。日記是按時間順序紀錄，說明每日的空間移動；但是遊記是以相關類型的旅遊地點為核心，因此歸納不同時間參觀的見聞，將參觀過的地點皆歸納於同一節中敘述。林獻堂於日記中擇取當天印象深刻的圖象，記錄行走過的痕跡；在遊記中亦選擇某些心中的風景，並加以鋪陳敘事。文中對世界都會的讚嘆與批評，以及對歷史人物形象塑造與褒貶，皆透露出他個人的思想與價值觀。環遊世界是林獻堂自我沉澱、開展思考廣度的自覺活動，並以日記體或遊記體抒發他的旅遊體驗。日記體是行之有年的舊文體，卻可承載旅行世界各國的新見聞；又伴隨著新式傳播媒體的興起，遊記有了新的發表管道，也因此影響遊記的書寫策略。

林獻堂四十六歲時決定從事這一趟文化之旅，而且是與兩個兒子同行的自助旅行。於旅遊書寫中常興起懷舊的情緒，在他參觀古蹟、歷史場景後，多藉由日記與遊記再現這些有關異國的歷史記憶。他們的環球之旅並非只是欣賞風景，他們經常前往公園聽演講，再加上參觀議會等行程，呈現欲親身體驗民主制度的欲求。在這趟長期的環球之旅中，林獻堂透過比較、觀摩與學習過程裡，重新省視自己的處境及文化特質，進而擴充觀看世界的視野。台灣屬於文化文流領域相當特殊場域，處於日本殖民時期的林獻堂，長期關注台灣的社會文化現象，此次環遊世界的旅程更促使他開拓日記與遊記書寫的面向，發展出深具個人風格的文化啟蒙論述。

